

河北历史名人传

政治军事卷 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历史名人传

政治军事卷 上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近代以来，河北一直处在政治军事斗争的游涡之中，故而政治军事要人层出，而且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

本卷收录的 60 余位军政人物分上下两册出版。我们未按通常的政界、军界划分，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既是政界人物，亦是军界人物，或由政而军，或由军而政，或军政不分，是其重要特征，故以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斗争性质及特点分册。上册收录的为中共军政人物及爱国民主人士，下册收录的则是晚清及民国军政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伟大的历史变革莫过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一伟业中，燕赵大地涌现出许多杰出儿女，他们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贡献将永留青史。本卷上册收录的李大钊、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者。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先驱，他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参与缔造了这一先进政党，后来他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英勇牺牲，他光辉的一生永为后人敬仰。河北亦是北方共产党早期创建地之一，革命元老江浩、李锡九即是早期河北省共产党创始人，他们经历了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转变到坚定的中共党员的历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一批资深望重的革命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都担任中央或省级要职，如王任重、康世恩、刘宁一、王昭、杨秀峰、徐冰、张霖之、刘秀峰、林铁、张苏等，他们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各项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本卷上册收录了红军时期重要军事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张兆丰、韩永禄等烈士的事迹，还收录了革命女杰刘清

扬、张秀岩，为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领导干部杨耕田，在建国后不唯书不唯上、敢于坚持真理的胡开明以及著名军事将领张克侠、何基沣等人的传略。爱国民主人士王葆真、杨十三等人的传略也收入其中。

从推翻清王朝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亦是一场重大历史变革。晚清、民国时期，国势颓危，内忧外侮，政坛军界纷乱不已，动荡不安，一些直隶籍（即河北省）人士在这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身居高位要职，曾在近代史上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本卷下册收录了晚清重臣、著名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传略，他在力图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的同时，创办洋务，设厂开矿办校，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民国建立后，河北成为北洋直系军阀大本营，本卷收录出自该集团的重要军政人物有：两位民国总统冯国璋、曹锟；两位国务总理王士珍、张绍曾；著名的爱国军事政治家冯玉祥；在抗日战争中浴血抗战英勇捐躯的国民党上将佟麟阁、郝梦龄、武士敏；在解放战争中认清形势率部起义的高级将领高树勋、张权、郭宗汾，以及最终脱离蒋介石集团归向人民的高级将领鹿钟麟、李兴中、商震、张之江等人。另外还收录了国民党上将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传略，对于个别军阀、政客的传略也少量收录，以有助于读者从不同人物的经历中了解近代史，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在本卷的编辑过程中，由于资料和时间所限，难免有疏漏不妥之处，诚望有识之士指正。

编 者

目 录

耿耿丹心昭日月

——王昭传略 姜廷玉等 (1)

忠诚坦荡才识过人的共产党人

——记王任重 范 康 (18)

民主斗士王葆真 杨 子 王普 (33)

中国工运领导人刘宁一 温 原 (45)

新中国建工部门杰出的领导者刘秀峰 田兰花 (61)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 胡霭立 鲁开荣 (71)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江浩 范玉凤 (83)

燕赵奇士何基沣 许灵俊 (93)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崔艳明 (108)

革命老人李锡九 董树荣 (130)

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记张苏的革命生涯 张子儒 杨建军 (137)

张申府传略 张燕妮 (151)

佩剑将军张克侠 任方明 (163)

中共早期的北方军事领袖张兆丰 张璧珩 李凌宇 (173)

战斗在第二战场的女杰张秀岩 韩一德 (182)

煤炭部长张霖之传略 刘秉禄 (196)

呕心沥血为燕赵

——林铁传略 茂 魁 坤 赤 (212)

民族之杰杨十三 刘绍友 (227)

“红色教授”杨秀峰 刘绍友 董树荣 (236)

-
- 英年早逝的省委书记杨耕田 吴永田 天 波 (252)
冀中根据地的开创者孟庆山 赵云山 (267)
旧军人的大旗周思诚 杨子 丽 英 (278)
青山树碑 松竹长啸
——记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 李 直 (287)
“开明”公仆胡开明 贾文平 (300)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旗高擎赵博生 赵智慧 (317)
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徐冰 刘明沫 (326)
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康世恩 韩进福 (334)
燕赵忠魂阎达开 王 江 (343)
“高台著荣光”的红军将领董振堂 范玉凤 (355)
农民运动的领头人韩永禄 阎 丽 (369)
爱国民主人士焦实斋 焦景文 (380)

耿耿丹心昭日月 ——王昭传略

姜廷玉 王 诚 李运亨

王昭，1917年7月19日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后担任平山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解放军六十四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担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

王昭在初小读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的北伐战争前后，在他少年稚嫩的心灵中朦胧地感到：为什么我们村多数人挨饿受冻，少数人有钱有地？为什么“国民革命”早已“成功”，而“耕者有其田”至今不能实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家庭困难，王昭难以升学。经王诜（小学教员、共产党员）介绍，他参加了平山县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在“读书会”组织的读书活动中；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在王诜的帮助下，15岁的王昭于1932年7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昭入党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3年春，在平山县七庄高小读书的王昭，积极组织出壁报、向同学发表演说，反

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动员了同学何思礼和他一起准备到前线参加抗战。他们走到保定，由于路费花完了，只得返回学校。

1933年暑期，王昭高小毕业后回到本村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开展革命活动。这一年王昭介绍了两名同志入党，他任村党支部小组长，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斗争。1934年，王昭任村党支部书记，除继续发展党组织外，还组织了“穷人会”、“雇农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和叔父王廷焕一起，秘密将油印机转移到村里，印发传单，宣传抗日道理。天井村成为平山县党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的村庄之一。

1935年春，平山县成立了官办的手工织布厂，正式名称叫平山县简易工厂。王昭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该厂以当练习生为掩护做党的工作。王昭在简易工厂首先建立了党支部。同年4月，平山县委任命他为驻城关特派员，统一管理平山县城附近的党团工作。他在县城及附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简易工厂领导了多次罢工斗争。在斗争中，王昭通过考察和艰苦的工作，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

同年初秋，共青团平山县委在平山城关北小学成立，栗政清任书记，王昭担任组织委员，曹慕尧担任宣传委员。8月，王昭参加了中共直西特委、平山县委的联合会议，研究部署了发动贫苦农民分地主粮食的行动计划。农历九月十三日晚，在游击队的掩护下，十几个村的党团员、穷人会员和贫苦农民共400余人，一夜之间分了木盘村大地主的800余石粮食。木盘村分粮斗争轰动了全县，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1936年1月，王昭任团县委书记，并任党的县委委员。在此前后，国民党一个骑兵团窜入平山县，对平山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投机分子张惠森叛党投敌，直西特委组织部长贾良田和一些游击队员被出卖，英勇牺牲。白色恐怖笼罩

着全县，敌人贴出布告捉拿王昭。王昭和他的战友们带领游击队，长期转战在深山里，与敌人周旋。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6年3月，王昭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根据河北省委指示，王昭和县委其他成员认真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6月底，王昭和省委交通员杜希文一起到天津向河北省委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省委陈少敏向他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要恢复整顿、隐蔽党的组织，停止暴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向灵寿、阜平、正定、井陉、盂县、五台一带发展，以做好抗日前沿阵地的准备。

王昭接受任务后返回平山，向李芳林、李耀祖、芦瑾亭等分别传达了省委的指示，随后恢复了洪子店以东、平山城西一带的部分党组织。不久，王昭给省委写信汇报了情况，省委复信说：“山货买卖好做，即派掌柜的带款去经营。”10月，省委派曹镛（曹慕尧）到平山，由曹镛、王昭、李芳林、杜希文等组成新的县委，曹镛任书记，王昭任副书记。

1937年初，曹镛到石家庄与特委联系工作，被叛徒发现，特委当即决定送曹镛到延安“红军大学”学习，由王昭继续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王昭和县委其他成员恢复和整顿了洪子店以西的党组织。至此，平山县党组织大部分恢复，全县有40多个支部，党员发展到700余人，成为抗日的一支中坚力量。王昭和县委还准备组织一个团的兵力奔赴抗日前线。

二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我党积极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此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表面拥护统一战线，实际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阎锡山

知道平山共产党有基础，派他的高级参谋张岳山到平山企图利用共产党势力招兵买马。当姜占春、梁雨晴向王昭汇报情况后，王昭认为：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扩军，他要拉走队伍，妥协投降，我们就要把枪口对准他。王昭作为平山县共产党的代表与阎锡山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向张岳山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并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合作发动群众，抗战到底。只要有钱有枪，我们可以建立起成千上万的人民武装，把太行山以东当作抗日第一线。”经谈判，初步达成了几项协议：（一）赞成联合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同意共同组织抗日武装部队；（三）部队由共产党动员人参加，阎锡山出武器、出钱；（四）部队内建立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制度，设政委……。

农历九月份，王震派陈宗尧、刘道生带领八路军一个工作团到达平山，着手组织共产党自己的队伍。群众听说八路军到了平山，都奔走相告，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不到一个月工夫，成立了1000人的“平山团”，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其中党团员占50%，贫农会员占50%。在成立平山团的过程中，王昭和县委协助刘道生做了大量工作。此时，石家庄特委李德仲带一批人到平山县组织晋察冀四分区特委，王昭担任平山县中心县委书记。

1937年秋，日军侵占石家庄，旋即进攻平山。王昭和他的战友们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在平山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建立平（山）、井（陉）、获（鹿）游击支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八路军五团攻打日伪盘踞的平山县城，王昭带领数千名游击队员和民兵到第一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在这次战斗中，他被评为作战模范。

从1939年10月起，王昭任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在对敌斗争中，他沉着勇敢，冲锋在前，发挥了一个政治干部、军事干部的领导才能，表现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本色。1941年秋季，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四分区机关及广大群众转移到十几里长的张家沟山谷里。傍晚，一架敌机向张家沟低空盘旋侦察，王昭估计翌日拂晓敌人要偷袭张家沟，于是召集各村干部一起研究，嘱咐他们立即带领群众分头转移，自己则带领警卫班在沟口警戒掩护，直到所有的群众都安全撤出了张家沟，敌人偷袭部队进至沟口，他才机智敏捷地和警卫班转移出去。东柏坡的老贫农王树忠、刘庆文等至今还念念不忘地说：“不管敌人如何诡计多端，也出不了王昭所料。那时节，要不是王昭胆大心细会指挥，老百姓都得叫鬼子的机枪给撂倒了。”

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王昭亲自把晋冀党校1000多名干部安排在山连山的平山、井陉交界的转嘴村一带，他和少数干部始终坚持在滹沱河北岸环境最艰苦的地区。在敌人向滹沱河南岸地区反扑时，王昭先敌赶到转嘴村一带，带领党校干部转移到滹沱河北。队伍走到马峪一带时，沿路尽是民兵遍布的地雷，没有向导带路，谁走在前边都有触雷的危险。王昭拦住大家，下达命令：“谁都不许走在我的前面。”还说：“谁也没有我的眼睛看得清，瞅得准，知道地雷埋在什么地方。”王昭亲自在前，大家相随，安全转移。等数路敌人偷袭到转嘴村一带时，干部群众已安全转移到滹沱河北部地区。

频繁的战斗，紧张的工作，使王昭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这时他又患了严重的疟疾，因缺药少食，他的高烧一直不退，但他从未停止工作，人们劝他休息休息，他说：“中央的指示要传达，秋收秋种要布置，我怎能休息呢？”

1944年的一天，日军将平山一带各个碉堡上的日伪军头目召集到石家庄赴宴，庆祝他们的所谓“赫赫战果”。王昭和他的战友们乘虚而入，率部攻下了日军多年盘踞的双石洞碉堡，缴获了山炮一门及其他战利品。这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

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同年9月，王昭任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冀晋军区副政委。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昭代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石家庄执行小组，同美蒋进行谈判。在和谈开始，国民党方面以我方代表张雨初（四分区副司令员）、林兆南（英文译员）没有护照为由，将其无理扣押，并施以种种酷刑。王昭向国民党方面代表罗历戎和刘英提出抗议，使张、林二人得以释放。有一次国民党方面企图借市民缺粮问题，煽动群众到我方谈判代表驻地起哄，王昭沉着冷静，向广大市民当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明确指出，广大人民群众缺粮的祸根，是国民党当局设卡封锁边区的结果。市民群众得知真相后纷纷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弄得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由于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和谈毫无结果。之后，王昭等到北平向中共代表叶剑英作了汇报，并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同年7月，晋察冀军区党委调王昭到晋察冀军区四纵队任副政委。当时纵队司令员是曾思玉，政委是胡耀邦，参谋长是唐子安。1948年初，胡耀邦调走后，王昭继任四纵队政委。王昭和曾思玉等率领四纵队转战于平北、冀东、京汉铁路沿线，解放了大片国统区，并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

1948年12月初，我军发起平津战役。王昭奉命亲率四纵队十二旅由新保安东北麻峪口出发，经过20公里急行军，以突然袭击手段，一举攻克新保安，消灭了守军。接着，利用西八里、新保

安、东八里三地区的有利地形，采取纵深梯次配置，将主要兵力、兵器配置于铁路公路及其两侧地区，以节节抗击的战术，坚决阻击国民党三十五军东窜。王昭下令说：只要我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敌人三十五军向北平靠近一步。经过两天激战，以少数兵力抗击了数倍于我之敌的进攻，消耗和阻击了敌人，粉碎了三十五军东窜北平的企图，从而保障了我军主力适时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新保安地区，对整个战役计划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该旅受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司令部的通令表扬。

1949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进行整编的决定，王昭所在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四纵队整编为中央军委直属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王昭继续担任军政委、军党委书记。在太原战役，解放银川、平凉、兰州等战役中，六十四军英勇善战，横扫国民党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9月，王昭作为解放军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王昭率领六十四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11月任志愿军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作战有功，王昭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四

1952年，毛主席亲自批示在公安部建立政治部。1953年3月，王昭从抗美援朝前线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后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党委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王昭到任后奉上级指示在各省公安系统普遍建立了政治部。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县以下基层公安机关党的领导制度很不健全，存在只抓业务，不管人的思想的现象，他便根据军队政治工作的经

验，结合公安战线的特点，经过党组讨论，明确规定了县公安局设教导员，派出所设指导员。

为了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1953年王昭受上级委托筹备了全国公安系统组织整顿、干部排队会议；1954年公安部政治部指示各大区公安部门政治部要普遍对干部进行一次审查。在审查干部当中，王昭严肃认真，一方面要求大家反复学习文件，另一方面要求大家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作结论前要听取被审查人的意见。对重要问题作结论时，他除亲自看档案、听汇报外，还提交党组认真讨论决定，发现差错及时纠正。原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葛申，曾在白区工作时利用敌人电台为我方工作。在审干中有人误认为他投敌叛变问题严重应予判刑。王昭认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持慎重态度，要进一步查清；在未查明的情况下就按敌我矛盾对待是不妥的。根据王昭的意见经过多次查证，终于搞清事实真相，为葛申同志平反，并任命他为公安部某局副局长。

为了培养公安干部，除建立公安学院（王昭兼任院长）外，他在任上时相继在各大区设立了公安学院分院，兴办了公安学校60多所。为使公安队伍学习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王昭协助部党组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在公安系统开展立功创模先进工作者运动。王昭还经常到公安学院作报告。教育公安干警要为人民办好事，规定每年春节开展爱民月活动。

在日常工作中，王昭注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1956年机关干部调级时，毛主席批评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现象在公安部也是存在的。针对这种情况，王昭在会上反复作思想动员工作，号召“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人民币服务”，并在会下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走群众路线，纠正了调级工作中出现的不正确思想。当部党组研究决定王昭提级时，王昭婉言谢绝说：“我是做这项工作的，不能带这个头。”

王昭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1958年冬，在十三

陵水库工地劳动时，王昭迎着凛冽的寒风，推着小车一溜奔跑。同人民大会堂动土兴建，王昭率领公安部机关干部参加劳动时，不仅组织大家实干加巧干，而且带头挖土、拉土。在评比时，公安部赢得了第一名，这和王昭的带头作用是分不开的。在落实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时，在部长级干部中，王昭首先报名到清河农场劳动。炎热的夏天，他顶着酷暑，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和同志们在农场劳动了一个月。为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王昭兼任公安部体协主席，带头坚持天天锻炼身体，取得了等级运动员的称号。在部党组的领导和他的亲自组织下，公安部体育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北京市篮球比赛时，公安部篮球队获得冠军。在我国举办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安篮球赛时，王昭为主任委员，中国公安“前卫队”又获冠军。

王昭虽然职务不断提升和变化，但他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本色。抗日战争时期一床军被随他进了城，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又伴随他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进了北京，一直伴随着他被林彪集团迫害入狱。1953年，原部队的同志为关心王昭的身体，给他送来了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王昭把它原封不动退了回去，并给那位同志写了封信，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永不能变。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前线收到弟弟的一封信，说母亲从平山老家到石家庄来了。王昭立即给弟弟回信，要弟弟劝说母亲，在石家庄住几天就回家去，不要在城里吃闲饭，不要离开劳动。他还让弟弟向母亲说明，她的儿女不是“做官”，不是“新贵”，是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母亲理解儿子，高高兴兴地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王昭的父亲病重，他从北京经过石家庄探望父亲。在石家庄工作的老战友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王昭婉言谢绝。他亲自到汽车站买了车票，乘公共汽车回家。在杨树车站下车之后，碰上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阎九林一见王昭依然是朴素的穿戴，步

行回家，心中十分钦佩，情不自禁地上前紧紧握着王昭的双手，说：“哎呀呀，小王（王昭在平山地下工作时，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小王”），你当了副部长，成了高干，还是一个小王啊！”王昭亲热地握着阎九林的手，风趣地回答说：“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撅起嘴来，不叫我小王啦！”阎九林常跟人说：“王昭，高干不‘高’！国家干部要都这样，就好了！”

五

1961年春天，在中国人民困难时期，王昭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奔赴困难极端严重的西北青海高原，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那几年，青海省委的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大搞高指标，出现浮夸风；提出了“超越历史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牧区以开荒为纲”，要达到“亩产八千八百五十五斤”等“左”的口号，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造成了民族不团结，生产大幅度下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后果十分严重。王昭到青海后，面临着人瘦、地瘦、牲口瘦，田园败落、万户萧疏的景象，心里十分着急。他像当年在前方打仗那样，在高原特有的春寒中，奔波在湟水两岸、青海湖边，出进农民的土屋，牧民的帐房，了解情况，体察民情。他首先着手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并和省委其他领导一起研究迫在眉睫的春耕生产问题，制订当年生产大计。

要克服困难，扭转局面，把青海的工作推向前进，就必须坚决地纠正“左”倾错误。要做到这一点，当时的阻力很大。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王昭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拍案而起，把帽子甩到桌上，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刹住歪风，纠正错误，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也心甘情愿！”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

充分发扬民主，批判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以及脱离实际在牧业区搞以粮为纲，破坏草原建设等“左”倾错误，使大多数干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左”倾蛮干，玩忽党的方针政策，任意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给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基础上，王昭和省委的其他领导根据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响亮地提出“正确认识青海，积极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等口号。在1961年和1962年，省委从青海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农业区提出了“轻税政策”，少征购或暂不征购粮食，鼓励农民多种多收，获得了1963年的农业大发展，1965年在青海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在牧业区，因地制宜地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纯牧区主要是把牧业生产搞上去”，从而纠正了大量开荒造成破坏草原、破坏牧业生产的现象，调动了牧民牧业生产的积极性。王昭在亲临牧区调查研究中，看到严重的鼠害对草原建设的破坏，马上组织力量制造灭鼠药品，亲自督促交通部门日夜兼程运往牧区，迅速刹住了草原退化问题。他号召牧区干部群众“保一只羊”、“打一只狼”、“做好一家一户的思想发动工作”、“搞好每一个生产队”。这种从“一”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求实精神，迅速扭转了全省畜牧业生产的面貌，1965年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六

建设青海，先要正确认识青海。1963年，王昭根据省委的决定，着手调查研究，制订建设新青海的蓝图。他思考着：青海能不能建成祖国的粮仓？草原建设如何着手进行？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的丰富矿藏资源怎样开发利用？通向西藏和新疆的铁路怎样尽快修成？……为了获得正确的答案，他越荒原、走戈壁、攀